

王世慶先生得獎感言

王世慶

陳慧先 文字整理



國史館林館長、文獻館謝館長，各位教授、各位貴賓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我今天能夠獲得臺灣文獻館頒發給我第三屆臺灣文獻獎，覺得很高興、很榮幸。在此要表達深深的謝意，同時我也要向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給我推薦、還有各位評審委員對我文獻工作的肯定與愛護，深表感謝。

我是在民國三十八年二月，承蒙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先生的提攜，到顧問委員會任採訪員，開始進入臺灣史的研究。當時是光復後沒有幾年，我在進入顧問委員會以前，只有在學校臺北師範聽過了國分直一教授的東臺



王先生發表得獎感言（康麗莉拍攝）

灣、宜蘭史前遺跡的調查報告，和關渡的社會民俗調查的講義而已，對整個臺灣史全然不能全部認識。還有當時也是光復後不久，過去受的是日本教育，是日文的教育，光復後要馬上用中文寫作，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。所以我第一個步驟，是從伊能嘉矩的《臺灣文化志》、井出季和太的《臺灣治績志》和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《警察沿革志》開始，念了這三本大作以後，就大致了解臺灣史的大概。那一方面我就練習習作，寫臺灣史事的小文章，例如〈臺灣行政區域之變遷〉、〈博物館在臺灣〉、〈洋人的史蹟在臺灣〉、〈臺灣山地教育史略〉等等，藉著這些文章開始練習寫作，在報紙「全民日報」、「公論報」、「新生報」發表，經過了這些過程而進入研究的領域。

在民國四十一年，我就擔任主任委員黃純青先生的助理，協助編纂《臺灣地名沿革》。那時候照黃純青主任委員的指示，設計了臺灣新、舊地名的對照表，就是日本時代的大字、小字跟光復後村里的對照，

一一向全臺灣的各鄉鎮市區公所發文，請他們填報這些資料來作為基礎，編纂臺灣的地名沿革。這種工作在日據時期政府會做，譬如大正九年時把以前的大庄、小庄改寫成大字、小字。大字、小字日本叫作「おおあざ」、「こあざ」，是大庄、小庄的意思，對照後，他們政府就會馬上印出來公布。光復後政府忙著其他的工作，這點就做不到。所以文獻會成立以後，民國四十一年，就著手作這個全臺灣的調查，這是基層地名沿革的基本資料，假如當初沒有作調查的話，我們以後恐怕更困難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那時候的鄉鎮公所還有很多當地的人在服務，那些人就比較熟習自己地方地名的情形，這是那次調查的重要基礎。



典禮開始前王先生與哲嗣王孟亮教授（右一）、周婉窈老師合影（康麗莉拍攝）

後來我就編纂《臺灣省通志稿》的行政區沿革篇，後來連續纂修《臺灣省通志稿》、增修、整修《臺灣省通志稿》，還有重修《臺灣省通志》。四次的纂修我都參與，這恐怕沒有第二個人了。這是我在地方志纂修方面的紀錄。現在是已經在纂修《臺灣全志》了，這是第五次的纂修。這四次的纂修，我一共修了八篇的臺灣省通志。另外，在這期間，我也協助各縣市志的編纂，譬如臺北市、臺北縣、宜蘭縣、高雄市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。這些縣市志我也協助編修了十一篇，這是我在省文獻會服務當中，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工作紀錄。

另外，我在文獻會服務的期間，一共有三十五年，這期間我也寫了一百多篇的大小篇論文，其中我也當過省文獻會的整理組長，所以史料方面的著作也不少。所以史料的收集、存藏、保存、研究也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。所以我的著作當中，有關臺灣史史料的介紹、研究的部分也不少，也就是這個原因。

後來，在民國六十二、三年，我一度離開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到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，和美國「猶他家譜協會」去作古文書契約的收集調查，和族譜的收集調查。這兩項工作，有一部分是日本時代就做了，但民間還有不少的古文書契約相當重要，族譜過去因為是自己私人家的資料，不隨便公開流通，所以也比較少蒐集，譬如蒐集臺灣資料有名的省立臺北圖書館，就只有五、六部的族譜而已。所以這兩項，我就是認為在臺灣的史學界相當重要的工作，所以我就到了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和「猶他家譜協會」去做這兩項的收集工作。特別是古文書、契約書的收集，有五千六百多件，相當受到了當時的學術界的注意、關心，所以後來有很多研究臺灣史的學者都投入契約文書的利用收集。在座的黃富三教授他也收集了霧峰林家的契約文書，至少有二、三千件，許雪姬所長也收集了臺中縣龍井的古文書，臺灣師範大學的吳學明先生也收集了金廣福的古文書，將近一千多件。還有很多很多的學者收集了不少的資料，所以這個工作就被推廣了。今天臺灣的各級各縣市的文化局、文化中心，以及古文書、古物的收藏者，或者是其他的學術機關，都有不少的契約文書跟古文書的收集和整理，所以這個工作是很重要的，已經普遍地被認識，所以這些資料應該收集後好好整理，要利用、要研究，才是最終的目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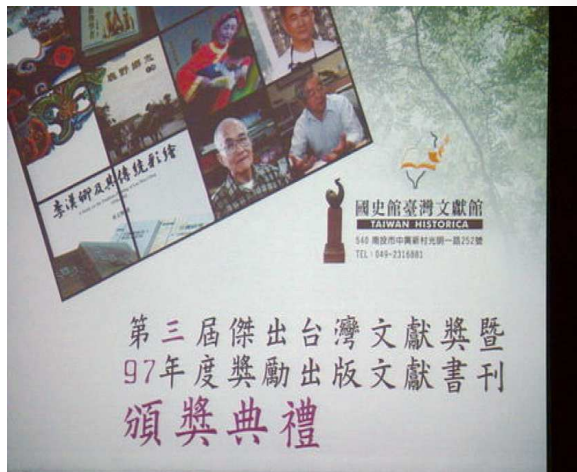
右起王先生、許俊雅教授、陳鄭添瑞先生、郭双富先生（康麗莉拍攝）

另外一方面是，臺灣的這個地方志的纂修也在文獻會、文獻館的帶動之下，推廣了下一層鄉土志、鄉鎮志。所以鄉鎮志現在也是全臺灣都在進行纂修，大概起碼有三分之二的鄉鎮都有，文獻館應該可以鼓勵各鄉鎮，還沒有纂修的把它纂修起來。這樣臺灣的地方志就不只是以前

清代的府、縣、廳志而已，可以達到下一層的鄉鎮志，能夠普遍地編修好，讓臺灣的人民更能了解自己鄉土的基層資料。

我之所以能夠在文獻會待下去，主要是因為我的興趣。我對臺灣史很有興趣，所以很樂意去進入這個領域去投入、去工作，這是我六十年來能夠一貫地作臺灣史研究的原因，樂趣是在這裡，也有一些成果。這些資料的收集，我也被我的老師肯定，有一次我的老師國分直一先生從日本到臺灣來，要收集《チョプラン嶋之記》的插圖，我陪他去交涉、去拍照的時候，好幾年沒有見面的國分直一先生，還認得我，說：「你實在是非常成功的臺灣文獻學者」，我很高興受到自己老師的誇獎。

我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在文獻的工作、歷史的工作，所以後來我退休後也到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作兼任研究員，繼續服務。到了兩、三年前，已經年紀不少、退化，所以現在就已經不能夠再從事著作，但是重要的臺灣史的現象，我還是很留意的。所以我謹祝臺灣文獻館能夠永續發展，帶領臺灣文獻的收集跟臺灣史的研究與發展。這是我的一點感受，請大家指教。



頒獎典禮會場布幕（康麗莉拍攝）

附記：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，金柏全同學與我再度到王世慶先生家拜訪。我的目的是請王先生校訂「得獎感言」，金柏全同學則是請王先生分享他對「日治時期實業教育」的看法。此外，我們也請問了王世慶先生，國分直一教授對他的影響，以及後來兩人之間的聯繫。

王世慶先生說道，他在臺北師範學校期間，和國分直一先生的接觸其實並不多，僅在戰爭期間疏散到宜蘭時，聽過國分直一先生的「陣中

講義」。不過，他特別強調，國分直一教授是當時日籍老師中最親切的一位。他舉了個例子：國分直一教授平常都稱學生為「〇〇さん」，調皮的同學們也就開玩笑地稱國分教授為「國分さん」，而不稱「先生」了。

戰後，王世慶與國分直一先生的往來，主要是透過王先生在臺北師範學校時期的學長劉茂源先生的介紹。一九八〇年國分直一教授到臺灣蒐集資料，經由劉茂源先生找到在文獻會工作的王世慶先生幫忙，兩人才開始比較熟識。一九九五年九月，國分直一教授受邀參加臺北師範學校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）創校百週年紀念學術演講會，會後也與王世慶先生等學生們聚會。

至於國分直一教授對王世慶先生的影響，王先生雖然並未多說，但言談中王先生提到了國分直一教授對他在文獻工作上的讚許。他有點害羞地說道：「在老師這樣說之前，我自己也不敢說啊。」可見昔日老師的肯定，對王世慶先生有相當的鼓舞作用。



王先生（右三）和其他得獎者與林滿紅館長（右四）、謝嘉梁館長（右五）合影（康麗莉拍攝）

（2008年11月22日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）

轉載自周婉窈「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」部落格：

<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jw!uduCo2SGHRYWIzLEAu0T/article?mid=303&prev=306&next=296&l=a&fid=12>